

萨特的哲学以存在主义为核心，聚焦自由、责任与本真性的复杂关系。本文从本真性的本体论基础——“存在先于本质”与绝对自由出发，剖析非本真性的遮蔽机制“自欺”，探讨自由、焦虑与他者构成的生存境遇，最后阐述本真性的实践路径及其伦理维度，揭示萨特如何引导个体在虚无与责任中实现本真存在。

一、萨特本真性理论的本体论基石

(一)“存在先于本质”与绝对自由

萨特本真性理论的根基在于其独特的自由观，其核心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人无预设的本质，因此行动是自我定义的唯一途径。他认为人类首先存在，通过行动与选择定义自身本质，强调“除了他所造就的自己之外，别无他物”。萨特认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核心特征。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写道：“人是被迫自由的”。萨特所言的自由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绝对自由，它与人的存在本身是等同的。这种自由是绝对的，因为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内在本质能够决定人类的行为。

(二)两种自由的区分

萨特区分了两种自由：“获取的自由”(实现期望的能力)与“选择的自由”(决定期望的自主性)。前者受外部条件限制，如残疾人无法选择行走；后者却是绝对的，个体总能选择如何赋予处境意义，如将残疾视为挑战或借口。萨特举例，一个没有双腿的人虽无行走的自由，却可通过其“根本谋划”赋予处境意义，如选择以残疾为骄傲或失败的借口。这种自由的双重性既带来创造的无限可能，也因责任的绝对性引发焦虑。萨特强调：“我们是进行选择的自由，但不选择是否自由，我们命定是自由”。这种“被抛进自由”的状态，意味着个体无法逃避自我定义的责任。

(三)意识的虚无化能力与自由的基础

萨特的自由概念奠基于他的意识理论中。

这种绝对自由源于意识的“虚无”(néant)本质，即意识通过否定既定事实，超越当下境遇，保持定义自身的无限可能性。萨特的意识理论将“自为存在”(être-pour-soi)视为纯粹的否定活动，不含实体性内容，其“自我虚无化能力”使个体挣脱任何预设束缚，构成了自由的本体论基础。例如，人感知桌子时，意识通过否定“我是桌子”确立自身，始终保持超越物化的可能性。

然而，绝对自由并非毫无限制。Landau (2012)批评萨特的自由观与现实冲突，如奴隶无法选择成为州长，表明处境限制了选择的可能性。尽管萨特通过区分“选择的自由”与“获取的自由”回应这一矛盾，但自由的绝对性仍因处境的有限性而复杂化。例如，一个身处战乱的人可能无法选择和平生活，但可选择以何种态度面对苦难，如反抗或顺从。这种张力使自由既是解放的源泉，也是焦虑与责任的根源，为本真性的实践奠定基础。萨特的自由观强调个体通过行动创造意义，即使在极端处境下，意识的虚无化能力也确保了选择的可能性。这种本体论自由使个体超越任何既定命运，成为自身存在的唯一作者。

二、自欺与生存境遇的挑战

面对自由的沉重责任，个体常通过“自欺”(mauvaise foi)逃避。萨特将自欺定义为系统性自我欺骗，个体否认自由与责任，假装是被外部力量决定的被动客体，而非主动塑造生活的主体。自欺并非简单谎言，而是意识的“双重否定”：首先否定自由，将自我固化为某种“本质”，如“我天生懦弱”；其次否定责任，将行为归因于环境，如“社会逼迫我如此”。例如，

萨特的本真性理论探析

■ 沈嘉怡 曾嘉懿

《存在与虚无》中，咖啡馆服务生夸张扮演角色，仿佛本质上就是服务生，而非自由选择扮演此角色。案例揭示个体通过自欺逃避自由的焦虑。

(一)自欺的表现形式

自欺通过两种方式遮蔽本真性：一是自我对象化，个体接受社会角色或静态标签，如“我是侍者”，掩盖意识的自发性；二是工具化他人，如在爱情中要求对方“永远爱我”，试图占有他人自由以缓解焦虑。他者凝视加剧自欺。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论断(《禁闭》)揭示，他人目光将我固化为客体，如“懦夫”或“侍者”，威胁自由主体。个体可能主动扮演他人定义的角色，陷入自我物化，沦为“活着的死人”。但萨特认为，自欺无法真正消除自由，因为选择扮演角色本身是自由行为。

(二)自欺的深层根源与内在矛盾

自欺的深层根源是对“时间性断裂”的逃避：固化过去行为为本质，如“我上次失败，所以永远无能”；拒绝未来可能性，如“追求理想必失败”。这源于意识对“虚无”本质的抗拒，即拒绝承认自身无预设本质，需不断自我创造。萨特指出，自欺构成悖论，“自欺是对自由的恐惧，却在恐惧中运用了自由”。选择逃避本身是自由的行使，印证了自由的存在。例如，赌徒发誓戒赌却重返赌场，他既知道自己选择离开，又以“冲动不可控”为借口，陷入自欺的矛盾。

(三)超越自欺：论本真性的实践之路

本真性要求通过“纯粹反思”剥离虚假自我标签，直面“存在的焦虑”。纯粹反思揭示意识的“原初状态”——人只是自由的选择者，无预设

本质。个体须承认“我是我所不是，不是我所是”，过去不定义自我，未来待创造。自由的双重性使本真性实践充满挑战。自由既赋予创造可能，也因“可能性晕眩”引发焦虑。他者凝视则要求个体在冲突中坚持主体性，同时承认他人同为自由的“自为存在”。例如，面对他人评判，个体可选择反抗而非屈从，从而确认自身自由。这种对抗并非否定他人，而是承认其自由，超越自欺的陷阱。萨特强调，社会规范常强化自欺，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固定本质的存在，加剧逃避责任的倾向。本真性的实践因此需持续对抗文化压力，保持意识的能动性。

三、本真性的实践路径与存在伦理

(一)行动中的本真性

萨特的本真性是动态实践，而非静态美德。个体通过持续的行动对抗虚无，定义自我，正如萨特所言：“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得以存在”。例如，投身抵抗运动或艺术创作，通过行动赋予存在意义。行动中的本真性要求个体为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如士兵参战须直面后果，无归咎于环境。与海德格尔的本真性不同，萨特的自由更强调个体行动性和瞬间决策，源于意识的绝对虚无化能力，而非历史性命运。萨特认为，自由使个体能从任何既定处境中“脱离”，进行无条件的否定与选择。这种行动性自由赋予个体无限可能，但也要求其直面选择的全部后果。

(二)悲壮抗争的本真性

萨特的理论带有悲剧性底色，称人为“无用的激情”(l'homme est une passion inutile)。人作为“自为存在”无法与“自在存在”合一，追求

完美本真性注定失败。但行动价值在于对抗虚无的姿态，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推石即是对抗荒谬的胜利。本真性实践体现为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明知自由无终极意义，仍以行动确证尊严。例如，个体选择坚持理想而非屈从现实压力，体现了对虚无的勇敢抗争。这种姿态不仅是个体行为，也反映在集体行动中，如通过社会运动对抗压迫。

(三)本真性对世界与他人的伦理责任

本真性不仅关乎个体，还涉及对世界的伦理责任。每一次本真选择都在为人类定义可能。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强调，写作是“向自由的召唤”，要求介入社会斗争，而非局限于艺术。后期《辩证理性批判》提出，集体行动通过共同目标赋予意义，超越个体冲突。例如，参与社会运动的个体在协作中实现自由，体现集体本真性。萨特认为，自欺是“他人即地狱”的根源，而本真性要求承认他人自由。例如，在爱情中，占有对方自由注定失败，唯有尊重其主体性才能建立本真关系。萨特在《存在主义》中指出：“人在要求自己自由时，也必须要求他人自由。”自由是相互建构的实践，个体通过捍卫他人自由拓展自身自由。

本真性的实践路径在于与他人动态平衡，既对抗凝视的客体化，又通过承认他人体性构建基于自由的共在关系。这种平衡非和谐共融，而是在冲突中承担相互解放的责任。例如，在社会运动中，个体通过协作尊重彼此自由，超越对立，实现集体自由。萨特的自由包含“责任向度”，要求超越个人主义，将他者纳入自由筹划的伦理框架。这种实践需持续反思与行动，避免自欺的陷阱，体现萨特对人类尊严与自由的深刻关怀。萨特的伦理视野不仅限于个体自我实现，更指向通过行动与共在重塑人与世界的秩序，赋予存在主义强烈的实践与政治维度。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 李丹莉

乡村文化振兴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亦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本文将从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两个维度，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引领作用。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为乡村文化振兴确立三个维度：

从理论维度看，“两个结合”指导我们在实践中既要立足乡村实际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又要意识到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需要不断发掘并厚植乡村文化，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础，不能简单地被城市文化覆盖。

在价值引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风文明建设，指引我们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村风建设，抵制不良风气。此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文化自信，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农民群众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发展动能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将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文化与生态、产业、人才协同并进，形成“文化+”的融合模式，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另一方面，强调城乡文化互补融合，而非简单的城市对乡村的“文化扶贫”。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宏大叙事转化为

乡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需要系统性、多维度、精准化的路径设计。

(一)强化党建引领，筑牢政治保障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力量。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村史、家谱等乡村资源，积极组织“乡村文化节”“农村春晚”“农村好声音”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村民在享受文化产品的同时接受乡村文化熏陶。同时须依托党建引领机制，将文化振兴的目标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确保文化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最后，还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惠民工程，推动乡村文化设施建设。

(二)培育文化人才，激发内生动力

人才是振兴乡村文化的核心要素。应着力吸引乡贤、企业家、青年等本土人才返乡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创业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他们返乡创办文化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还可设立乡贤工作室，让其发挥在调解乡里纠纷、传承优良家风方面的作用。最后，须构建多层次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要重视已有的乡村非遗传承人，可依托高校或文化机构，提升其理论修养与创新能力，对非遗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育新”，注重新农人的培养，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使其掌握现代数字技术，拥有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传播乡村故事、传承乡村文化。

(三)优化公共服务，满足精神需求

为保障农村的基本文化权益，还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与时效性，着力建设民生工程。须完善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乡村图书馆、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文化空间，并采取引入社会力量运营、联合地方文化人才协作、推行积分

激励制度等措施，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提高设施的利用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同时，政府要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机制，转变以往单向输出文化服务的方式，以人民群众为核心，倾听群众的声音，构建“群众需求导向、政府资源为保障”的互动体系，积极开展如“送戏下乡”、乡村电影放映、全民阅读等品牌活动，鼓励支持农民自主创作与表演村晚、广场舞大赛、趣味运动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使农民转变角色，从文化接受者主动成为文化参与者与创造者。

(四)推动产业振兴，促进持续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的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能够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为乡村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要结合本地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文旅产业，打造乡村旅游、手工艺品牌。例如，可依托古村落开发沉浸式剧本杀，结合农时节令举办乡村艺术节、丰收节等，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让文化“活起来”，将文化体验融入旅游全过程，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探索“文化+科技+产业”融合新模式，运用现代工艺理念与设计手段，对具有乡村文化特色的元素进行IP化开发，设计出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的数字文创产品、潮流玩具、生活用品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回应了为什么振兴乡村文化的问题，更系统阐释了实践路径。面向未来，须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突破人才资源瓶颈，在保护传承中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手段，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最终实现文化产业繁荣与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乡土、永续传承，为达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精神基础，注入持续文化动力。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 姜旭东

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必须突破主体不够重视和客体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全体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体共同努力，方能在农村地区更好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强化农村基层党建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直接执行者，以及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

一方面要明确基层组织领导责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引导作用，将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按照分工负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同时，要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培育工作成效纳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另一方面要优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应当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通过定期开展培训、交流学习等活动，提升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以及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要注重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农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丰富宣传教育方式

当前，想要更好地在农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方式不能仅仅是挂几条横幅、贴几则标语、开几场讲座，而应当创新话语方式、丰富文化活动。

一方面要创新话语方式。在信息时代，新媒体平台以其传播速度快、覆盖广、互动性强等特点，为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它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农民及时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在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教育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内容的质量和针对性。根据不同农民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要针对性地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以生动通俗的语言、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农民面前，以便农民群众更好地接受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要丰富文化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应当多样化，要摈弃过去只在会议室进行“课堂式”的培训，创新形式。例如，举办乡村文化活动，可以编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小品、歌舞、戏曲等节目，调动农民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使其从观众变为传播者；传统节日庆典是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契机，例如，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期间，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通过举办乡村文化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能够让村民在参与与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营造良好的乡村文化氛围，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提升农民综合素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从思想引领、需求满足、文明法治、科学创新等多维度协同推进。

一是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根基。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世界之钙，也是民族精神之魂。要依托农村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红色故事会”“乡

村党课”，通过老党员讲党史、革命老区研学等形式，强化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同时组织农业专家、驻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解读国家惠农政策，引导农民树立“共同富裕”信念。

二是要精准对接需求，回应农民关切。政府要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立健全诉求反馈机制，通过“村民议事厅”“田间调解站”，定期收集农民在土地流转、农业补贴、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同时，要坚持村民自治原则，由村民投票决定村级公共项目，确保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度。

三是要培育文明素养，提升法治意识。文明素养和法治意识要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追求和行为习惯，需要各种各样的活动作为载体，例如，制定村规民约，将孝老爱亲、环境卫生、移风易俗等纳入考核，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评选。建立“法治文化长廊”，定期开展“送法下乡”“以案释法”活动，普及土地承包、婚姻家庭等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增强农民法治观念。

四是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新时代下，要求加大对农民的培育，形成一支具备一定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生产组织方式的新农人队伍。政府要积极推动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培育，尤其是种养大户、生产大户等“龙头”，要鼓励这类符合条件的人群积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训、“头雁”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

提升农民综合素质需以“思想铸魂、需求为本、实践为基、法治为纲、创新为翼”为路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农民主体”的协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有理想、懂技术、守法纪、善创新”的新时代农民，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

泉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体系演进

■ 张毓琪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泉州市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体系历经十余年发展，依托多媒体、互联网、数字化等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其演进轨迹清晰展现了从基础探索到体系化革新的过程，不仅满足了不同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更为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动能提供了实践样本。本文主要从培训师资与内容两个维度探讨其发展历程。

二、师资队伍提质革新

培训师资作为技术传递的核心载体，其教学水平、跨学科合作能力与人员规模，直接影响培训的专业性、实际成效与覆盖面。泉州市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体系的师资发展，从单一到多元，从本地到跨域的网络构建，大致可分为“本地为主、规模有限”“逐步拓展、初现多元”“跨域整合、智库成型”三个阶段。

2008—2012年标清平台阶段。培训师资以泉州本地农业技术人员为主，受限于标清系统的技术架构，互动与传播范围有限，外地专家参与培训需到演播现场实时直播，产生的差旅费和时间成本较高，导致师资队伍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此时，师资多来自本地农业农村系统直属站、国有林场等事业单位，虽能基础技术培训需求，但在农林牧渔领域前沿技术、跨领域知识传递上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满足各细分领域的专业化需求。

2013—2020年高清平台阶段。系统经硬件升级后，视频画质显著提升，技术细节得以清晰呈现，同时新增手机、PC等多终端接入支持，进一步扩大终端覆盖范围。依托这些技术革新，师资队伍开始拓展：不仅引入领域专家，更吸纳了一些有丰富一线经验的技能能手，通过培训展示实操环节，帮助受众高效掌握技术。不过该阶段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参与培训需下载指定APP，操作门槛较高，且系统对同时在线终端数量设有上限，部分受众可能因此错过培训；另一方面，培训仍然需要专家到现场实时直播，师资资源利用效率难以充分释放，且此时的师资多以“单次邀请”为主，尚未形成稳定长效的合作机制，难以持续满足农民对多样化农技的学习需求。

2021年起，小鹅通数字化工具平台的应用彻底革新了师资体系。新平台支持微信扫码直接观看，大幅提升学习便捷性，且无终端收看数量限制，可满足大规模学习需求，更关键的是，预录制模式大幅降低了外地专家的参与成本，专家可利用空闲时间录制课程，无需到直播现场。这一阶段，泉州市科技人才服务中心整合跨域师资